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April 2021 第六期

| 時事評論 |

亞太專題

脫鉤與重建：拜登政府對中政策與日本政府對策 陳柏宇

拜登的國際棋局 吳嘉寶

中美貿易衝突下的RCEP 李佳

2021年兩會中共對台政策之評析 蔡文軒

緬甸專題

緬甸軍事政變的政治基礎 王文岳

初探美中對緬甸軍事政變之回應 司徒宇

| 研究論文 |

中國間諜對台灣的滲透 吳俊德



東海大學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unghai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April 2021 第六期】



東海大學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unghai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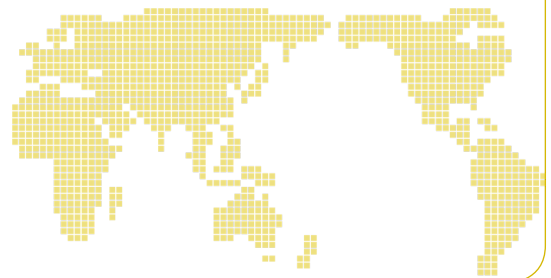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發刊辭

現代的政治及經濟環境隨著時代的變遷，呈現劇烈的變化，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景況及困境；此時，溝通平台的建立變得更加重要，我們希望能藉著期刊的建立，提供一個園地供學者們闡述其不同的理念與想法，也讓我們的讀者能了解區域環境的變化及其重要的議題。這次由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及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便是希望能透過論文的發表形式，為學者提供一個有效的交流平台，我們更期許它能成為台灣重要的發聲管道，為學術奠定基石，並有深遠的影響。

隨著網路科技進步，生活的環境產生了重大的改變，資訊的傳播與人際之間的關係連結，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在各自分工的領域上，也愈來愈精細。然而政治經濟的課題變動也顯得更加快速，新興的議題不斷湧現，亟需專家學者提出看法及因應之道。然而有些議題是以前少見到的，像負利率的出現、人工智慧的大量應用及人口老化的問題等等。更加上積弊已久的沈痾，像資本的過度集中、貧富不均的問題急速惡化、



國際間的貿易對壘嚴重，皆是刻不容緩的，且需要有智慧的處理。因此如何營造出一個公平效率又有正義的社會，為學者無法逃避的責任，我們期許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也盼望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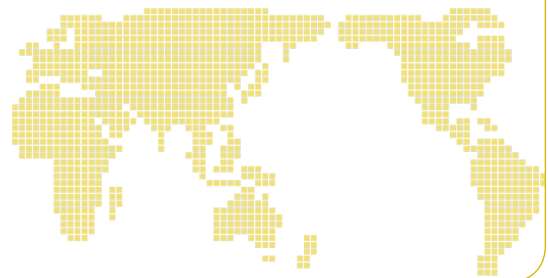
陳文典

2019.04.25

主編的話

2021 年第一季，全球仍舊處在新冠病毒（COVID-19）持續肆虐的威脅，以及美國和中國持續對抗的氣氛之下。美國總統拜登（J. Biden）從年初就任以後，美中的衝突未見緩解，外交上兩強針鋒相對的態勢，甚至比川普總統在任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方社會對中國持續採取圍堵的策略下，引發中國社會的反彈。以日前以新疆的人權和棉花議題為例，中國大陸內部出現了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抵制潮，對於若干外資企業和品牌銷售而言，在中國大陸都遭到了抵制，甚至引發外交言詞的對立，以及中國和歐盟之間相互制裁的結果。中國的戰狼外交也引起歐洲多國的反彈，使去年底簽訂的歐中投資協定出現暫緩審查的變數。另一方面，受到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復甦以及各國經濟成長都受到打擊，原本全球關注美中兩強經濟實力差距的問題也重新被提出討論。BBC 就引用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的分析指出，疫情下中美兩國復甦情況反差明顯，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可能提前五年，在 2028 年發生。

除此之外，亞洲的緬甸爆發了軍事政變。軍方逮捕了翁山蘇姬，



軍政府與抗議的群眾也爆發極為激烈的衝突，至今已經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遭補的嚴峻局面。緬甸的民主前景令人擔憂，而西方國家與中國大陸對緬甸的局勢是否抱持不同的態度，也令人關注。在這些多變的國際條件下，就個體層次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就兩岸層次看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就亞太層次看區域經濟整合的前景，都是耐人尋味且值得持續關注的問題。

基於此，本刊在 2021 年發行之《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第六期，提出了兩個專題的時事分析。專精於東南亞研究的司徒宇助理教授、王文岳助理教授，提出對緬甸軍事政變的分析與觀察。另外也邀請任教於日本新潟縣立大學的吳嘉寶教授、陳柏宇副教授、李佳副教授等三位老師，提出亞太政經局勢發展的分析與觀察。此外，針對中共召開的兩會，則是邀請了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的蔡文軒研究員撰文分析。在研究論文的部分，東海大學政治系的吳俊德助理教授，撰寫英文文章〈Chinese Spies' Infiltration in Taiwan〉，探討中國大陸的間諜滲透問題，通過兩位匿名外審，與讀者共享。亞太的政治與經濟仍舊處在高度敏感、多變的氛圍下。本期的期刊從不同的角度與關注議題，來自不同單位的研究學者撰文分析，希望提供對亞太政經發展更多元、更豐富的探討。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沈有忠
2021.04.12

“ 本期目錄 ”

發刊辭 / I
主編的話 / III

| 時事評論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 脫鉤與重建：拜登政府對中政策與日本政府對策
Decoupling and Recoupling: Biden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and Japan's Responses
陳柏宇 /3
Boyu Chen
- ▶ 拜登的國際棋局
Biden's Grand Chessboard
吳嘉寶 /9
KP Ng
- ▶ 中美貿易衝突下的 RCEP
The RCEP under US-China Trade Conflict
李佳 /15
Jia Li
- ▶ 2021 年兩會中共對台政策之評析
Analysis of the CCP's Taiwan Policy in the Two Sessions, 2021
蔡文軒 /25
Wen-Hsuan Tsai
- ▶ 緬甸軍事政變的政治基礎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Myanmar Coup d'État
王文岳 /29
James W.Y. Wang
- ▶ 初探美中對緬甸軍事政變之回應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Myanmar's Military Coup
司徒宇 /37
Yu Szu-Tu

| 研究論文 |

- ▶ Chinese Spies' Infiltration in Taiwan
中國間諜對台灣的滲透
Jun-deh Wu /45
吳俊德

協會簡介 / 67
徵稿啓事 / 69



|| 時事評論 ||

脱鉤與重建：拜登政府對中政策與日本政府對策^{*}

Decoupling and Recoupling:

Biden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and Japan's Responses

陳柏宇^{**}

Boyu Chen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4 第六期，頁 3-7。

** 陳柏宇為日本新潟縣立大學國際地域學部副教授。

前 言

今年 3 月 16 日，美國與日本的外交與國防首長在東京舉行 2+2 高層級會談，會後的聯合聲明中，針對中國「脅迫與破壞穩定的行為」提出警告，並特別提到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綜觀過去 20 年的 2+2 會談之聯合聲明，內容鮮少直接以負面詞彙點名中國，反倒是肯定中國對區域穩定的重要性。這樣的轉變若在川普任內發生，似乎不令人意外。然而之前被點名為親中派的拜登政權，甫上任不久便直指中國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有定調未來中美關係的重大意涵。在國防安全政策上，拜登政府並未全面翻轉川普政權時期的對中政策，持續強調「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聯合日本、澳洲與印度，明顯企圖遏止中國進一步擴張。而在經濟政策方面，與中國的供應鏈脫鉤（decoupling）的政策仍持續進行。今年 2 月底拜登政府甫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指示聯邦政府對於關鍵產品供應鏈，包含藥品、半導體、稀土金屬和電動汽車電池，進行審查，主要便是希望在這些領域上減少對外依賴，並促進美國國內產業發展。同時，在供應鏈的競爭上，冀求能協助其他國家脫離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進而擺脫中國透過經濟手段所進行的強制外交之威脅。

在美中對抗檯面化的格局持續，全球疫情依舊不見緩和的情況下，中國雖然千夫所指，卻也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首先是全球經濟疲弱之際，中國經濟復甦快速，並積極展開疫苗外交。對外經貿關係上，中國更與歐盟完成了投資協定談判，這次談判成功，扭轉中國被西方「圍堵」的形象。不僅如此，「東協區域廣泛經濟夥伴關係架構」（RCEP）於去 2020 年 11 月簽署完成，作為一個佔全球人口以及 GDP 30% 的巨大經濟體，RCEP 整合了東協與中日韓及澳紐之間的自由貿易關係。因此，即便供應鏈與中國脫鉤的效應在醞釀，但同時中國與各區域間的整合程度似乎也有更緊密的趨勢。

針對區域穩定與安全考量，「圍堵」中國的思維未見消退，但同時各國與中國經濟關係又十分密切。在此背景下，本文試圖分析，東亞民主國家如日本，如何因應拜登政權的對中政策，如何平衡其與美國及中國之間的關係，而其中同為

民主國家，值得台灣政府思考與借鏡之處。

供應鏈脫鉤或強化？

眼下的中美競爭，不僅是軍事安全領域上的對抗，更是技術霸權之爭，特別是鎖定高科技項目，供應鏈的集團化與對立似乎蓄勢待發。然而，從東亞區域經濟的來發展看來，全面脫鉤並無可能。例如去年底簽署的 RCEP 所承諾的關稅削減、寬鬆的原產地規則，外國直接投資（FDI）和服務自由化的結合，預期將活化區域內生產網絡，強化區域內的供應鏈發展。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組織的一員，RCEP 在簽署過程中淡化了脫鉤的敘述。如果中國從 2020 年的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動盪中復甦的速度超過其他國家，則其在區域一體化中的吸引力將會增強，在亞洲大型貿易協定中體現的區域一體化的引擎正在向前發展，此事實並沒有隨著美國對中政策改變。

就貿易依存度而言東亞各國對於中國貿易依存度仍高。近年來中國攀升為日本出口第一大國。儘管中美貿易戰加上美國對中國數位產品的限制，日本的出口數量也因此受到影響，但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依存並未改變。中國更是佔了韓國總出口量 1/4。東亞國家出口零件至中國加工為成品，因此也是中國供應鏈的一環。

此外，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對日本公司海外業務發展的問卷調查顯示，41% 日本公司計畫未來三年內擴大其海外業務至越南和其他六個主要的東協國家，而以中國為擴展對象的雖然由 2018 年的 55.4% 滑落至 2019 年的 48.1%，但仍位居榜首。中國的商業環境仍對於日本公司有相當的吸引力。除了「市場規模 / 增長潛力」和「客戶（交付目的地）公司的聚集」之外，「當地採購容易」也是排名居高之要素。許多進入中國的日本公司屬於「本地生產供本地消費」類型，除了作為消費市場具有吸引力之外，它們仍被定位為重要的投資目的地。為了因應中美貿易戰，僅有 7.6%（總數 3,563 家公司）回答說已經（或計劃改變）生產區域和採購 / 銷售目的地，其中大公司僅佔 11.9%。因此，未來整體區域內的供應鏈發展並未有弱化的趨勢，而真正對決的場域在於「戰略不可或缺」技術方面，與中國脫鉤，並在此領域形成供應鏈集團化。

「戰略不可或缺」技術脫鈎將是趨勢

過去「政經分離」是日本對中政策的大方向，盡量讓政治議題不要延燒到經濟議題。長期下來，儘管因尖閣諸島（釣魚台）問題關係曾一時惡化，至今中國對尖閣諸島也動作不斷，但中日之間一定程度維持了穩定的關係。然而政經分離，其實已經越來越難維持，原因即在於貿易關係中，早已涉及安全層次，無法完全切離，因此日本政府勢必在經濟與安全政策上面臨兩難。

日本同志社大學村山裕三教授於日本智庫 PHP 綜合研究所為文指出，1980 年代美國的武器 90% 依賴日本的半導體，使得美國警覺其國家安全出現了漏洞。這也顯示民用技術與軍事安全之不可分割，未來更是如此。如今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中的安全疑慮，隨著中美之間技術爭霸，更加凸顯。這些軍民兩用的技術領域，包含 5G、無人機、機器人和 AI 等，皆是中美之間高度競爭之領域，也是美國出手阻斷中國供應鏈的首要對象。這些領域，村山教授稱之為「戰略不可或缺」之技術，也是未來日本等東亞民主國家應合作，超越中國之處。

事實上關鍵技術所需要的資源，例如稀土，長期以來日本受制於中國。稀土是用於高性能磁鐵必不可少的材料，而高性能磁鐵是電動汽車核心組件之必要原料。中國占世界產量的 60% 以上。日本公司從中國採購稀土來生產高性能磁鐵，其客戶包括美國公司。關於稀土，由於 2010 年中日兩國在尖閣諸島（釣魚台）發生衝突，中國當局曾一時暫停了對日出口。中方將稀土定位為可以用作外交牌的「戰略資源」。今年年初，中國宣布將加強對稀土的管控，不僅影響在以稀土為原料的高性能磁鐵方面具有優勢的日本公司，而以美國公司為客戶的日本公司也將受到影響。

中國宣佈管制稀土的法令，應用範圍涵蓋從礦山開發到精煉分離，金屬精煉的生產和利用以及產品分銷的整個供應鏈。在進出口方面，公司必須遵守出口管制法律和法規，預計這項管制將與 2020 年 12 月生效的出口管制法合作，以加強對戰略物品的出口管制。

此外，配合美國對中國關於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使得日本公司不可避免

地受到不利影響。例如日本公司在中國市場引進半導體製造設備等具有戰略性的技術時，嚴重限制，例如上述日本對中國出口數量在近幾年減少即是一例。

為了避免追隨美國對中出口管制造成日本國內企業損失，而又能夠擺脫中國強制經濟外交，可以預期作為美國盟邦的日本將致力於建立多邊機制，同時國內進行科技研發（例如日本最近在樹脂電池量產的重大突破），重建供應鏈，以減少在兩大強權對立下的損失。

多邊機制重建關鍵技術供應鏈

外交事務季刊 2019 年 9/10 月號，現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 Jake Sullivan 和 Kurt Campbell 即為文指出，美國在決策過程中，特別是針對中國的政策，必須納入整合盟邦的概念。因為對於有美國後援的盟邦，中國才會更加謹慎對應之，不敢隨意以強制經濟外交作為手段。日本國內學者也呼應，日本必須與美國合作創建一個架構，使盟國可以共同討論中國出口管制與供應鏈脫鉤的議題，建立多邊合作機制。首先正是在稀土領域的日澳印合作。四國首腦在今年 3 月舉行磋商，確認分散供應鏈的必要性，將透過事務級官員啟動具體政策的協商。

在多邊機制的建立方面，日本政府必然鼓勵美國重返「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目前拜登政府有鑒於疫情重創美國經濟，並未立即承諾要恢復川普退出的 TPP 協定，然而可以預期透過多邊機制重建供應鏈這點，未來美日角色將會大大提升。

然而顧及中日關係與美日關係的平衡，對日本最有利的，便是確保其作為一個國家的「戰略不可或缺性」，促使美國和中國與日本合作的動機增加，使日本能夠抵抗外部壓力。因此，在美中霸權競爭時代，對於夾縫中的日本，最需要的是便是多邊機制的建立以及國內在「戰略不可或缺」技術上的研發與突破，藉此增強日本在同盟內部的戰略重要性，並增強其在中國的防禦技術優勢。在未來區域經濟與中國完全脫鉤可能性仍低的情況下，這點或許也是台灣可以借鏡之處。

拜登的國際棋局*

Biden's Grand Chessboard

吳嘉寶**

KP Ng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4 第六期，頁 9-14。

** 吳嘉寶為日本新潟縣立大學大學院國際研究及地域發展研究科主任。

自拜登當選總統，多次強調「美國回來了！」但這樣就可以除去川普以「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的爪痕嗎？世界各國，尤其是遭冷待、欺侮的盟國，就興奮地重投懷抱？美國也一如既往、順理成章重掌世界領導？然而，過去四年世界政局和力量對比已經出現重大改變，加上新型肺炎疫症全球爆發，美國的獨強一極的日子明顯成為過去。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的一份報告指出，從歐巴馬總統任內後期，就關注到「大國競爭」已經重啟，而川普也以此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只是拜登面對的是更深刻、更激烈和處於相對劣勢的全面競爭。換句話說，後冷戰時期，美國以唯一超強的姿態領導世界，自由民主政體儼然宣布取得最終勝利，以非國家行為主體（non-state actor）作為國際關係的焦點，如今這種設想不得不重回「大國競爭」的軌道。以下本文就嘗試圍繞這個中心，探討拜登時代的外交政策。

地緣政治：不老的傳統

拜登自 1 月就任，不足一個月就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網上特別版，大談重建大西洋兩岸合作關係。雖然歐洲關注的主要是俄羅斯近年日趨活躍，而且越來越具攻擊性的軍事活動，不過美國的戰略重點可能逐漸東移。首先，拜登在會上多次談到中國，他在國內則在國安會新設「印太事務協調官」職務，由歐巴馬政府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出任，正是由他構思 2011 年的「重返亞洲」戰略。據說，現在「印太事務」已經成為國安會內最大的部門。

反映在外交方面，拜登上台兩個月內，便召開美、日、澳、印的四國（QUAD）會談，又派遣國防部長和國務卿訪問日本，進行「二加二對話」，跟著是韓國，而日本首相菅義偉更成為拜登首位面對面接見的外國領袖，當中既表現出對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考慮，更凸顯美國強化同盟網絡的決心。這跟川普首先接見英國的梅伊、強調英美的「特殊關係」、要脅日本等盟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和當地駐美軍經費等舉措，大相逕庭。

當然，QUAD 不是近年的發展。最初四國只是因為對應 2004 年發生在印度洋的海瀾而首次合作，直到 2017 年才開始定期每年一度的會談，並在 2020 年

出現安全合作的突破。澳洲首次參加印度組織的馬拉巴爾海軍演習，指出這表現了民主四國的互信和共同維持地區安全的決心。就在去年，中國加強向澳洲經濟施壓，重燃與印度的邊境軍事對抗，頻頻出動海警船在與日本有領土糾紛的釣魚台／尖閣列島巡航，這些都加強了四國要聯合抗衡日趨強硬的中國，也讓拜登對這有所寄望。

與盟國溝通後，美國與中國在 3 月 18 日至 19 日期間舉行了高層戰略對話，這裡不贅雙方的唇槍舌劍，只是想指出，若我們把台前幕後綜合一起看，就會更精采。在對話前夕，「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在接受澳洲傳媒訪問時，強調美國不會丟下澳洲獨自面對中國的外交和經濟壓力，美國國務院又宣布制裁廿四名打壓香港民主化訴求的中國官員。在記者面前，美方說明不怕和中國的競爭，又直接道出要堅持原則和為盟友抱不平，難怪楊潔篪和王毅都要表現強氣。

差不多同一時間，拜登在電視訪問中指出俄羅斯要為干預美國總統選舉付上代價，駐美大使隨即被召回國，表示要重新調整對美政策。緊隨其後，俄羅斯外長便出發訪問北京。北韓因為馬來西亞要把一名該國商人移交到美國為違反聯合國制裁決議受審，正式與該國斷交。數天後，先試射短程導彈，看到美國低調指出這並沒有違反聯合國決議後，反為更進一步試射彈道飛彈，表明要看美國對他們違反決議的反應。

也許「大國競爭」只是一個委婉詞，集團對抗的趨向越來越明顯。當然，這不是說冷戰已經再臨，畢竟全球化已經使各國陷入千絲萬縷的網絡關係，美國的盟友或自由主義國有多少能與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與美國步伐一致？在 3 月的會議上，楊潔篪質疑美國發言的代表性，這確實是一個難題。

川普時代，中國抓緊機遇把自己推廣成為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忠實支持者，與美國當時的保護主義作強烈對比。一向以國際貿易為經濟發展動力的歐洲，當然不會因為大西洋彼岸再微笑招手，就輕易讓生意溜走。尤其作為歐洲經濟重要支柱的汽車業，更是倚賴中國市場。不但如此，德國也無視拜登警告，以能源安全和自主為由，繼續北溪天然氣管道二號的項目，讓俄羅斯天然氣運到德國。在 2021 年初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特別版，德國就不與美國同調，不願明確指出中國和俄羅斯是對手和威脅。法國總統馬克宏曾在 2018 年，面對美國退

出北約的不確定性，建議成立歐洲聯軍。如今，雖然不再明言，但在會議上強調歐洲「戰略自主」。不錯，在人權、民主等重大方向，歐盟、英國、加拿大等還是因為新疆人權問題而加入制裁中國官員。然而，美國已經無法肯定在什麼議題上西方盟友會如何歸隊。

全面的競爭

面對這場競爭，美國有學者建議拜登政府應選擇性地在地區安全、人權等議題對中國強硬，但是在環境保護和貿易方面爭取與中國合作。這種剛柔並濟的策略十分合理，但中國就這般簡單把政治、經濟脫鉤，讓美國當其世界政治領袖又從中美貿易中取利？現實是中國越來越重視運用自身的經濟實力去達到政治目的。只需看看在中日領土糾紛尖銳化時，一度限制對日本輸出稀土，打擊菲律賓香蕉進口以懲罰他們在南中國海領土糾紛中的對立態度，用各種手段影響澳洲一些漁農產品銷售到中國來報復他們要求國際調查新冠肺炎源頭，更不用說利用「暫停」陸客赴台自由行向民進黨政府施壓等。若我們不忘記「力」（power）在國際關係中，目的是改變目標國家的行為，那麼便說明了這些事情屢見不鮮，也談不上是「中國特色」。所以，與中國在政治對抗、經濟合作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很清楚，現在是與美國進行綜合國力的競爭。

首先經濟方面已經出現重大變化。相互依賴是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因為彼此的發展需要而從衝突轉向合作，避免戰爭以提供安全穩定的環境，全球化正是加深這種關係的力量。然而，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自從因為環球金融風暴而慢下來，便積極開拓內需，而且也促使他們重新評估與美國和西方的力量對比。溫家寶於 2003 年在美國的演說中提出中國崛起，完全不是偶然。到川普發動貿易戰更令中國決意把發展策略重心轉向國內。一家國際顧問公司在 2019 年中的研究報告就發出中國減弱全球化（disengagement）的警惕。習近平在 2020 年提出的大小循環經濟發展策略，就明確指向這方向。雖然相互依賴從來都不完全平等，但若這不平等嚴重向中國傾斜，或中國如此解讀，會有什麼發展？重溫 2019 年 NBA 因為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風波，又或今年因為新疆棉花事

件引發的抵制一些西方品牌。當然，這是在找軟肋。警示目標不純是商家，而是希望他們向自己政府施壓。

另一條「競爭賽道」是科技。上自太空，下達深海，中國都在積極追趕。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Eric Schmidt 指出，美國在人工智能只是些微領先中國，而且低估了中國從定向能量到極音速等技術的競爭威脅，在 5G 方面更讓中國搶占領導地位。哪個國家發展出下一代「顛覆性」技術，都會對國際政治格局造成極大震蕩，所以即使新總統上台，美國也不可能放寬對中國嚴控技術輸出的政策。

還有一條是無形「賽道」—國際話語權。習近平明言，信息空間話語權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所以中國近年常和西方隔空廝戰，甚至利用各種媒體影響輿情。而美國國內，因為川普大力撻伐主流傳媒做「假新聞」，以至小道消息橫行，增加了政府的施政難度。國際上，雖謂意識形態並非主導今天的競爭，但面對專制政體的再起，西方對敘利亞的巴沙爾·阿塞德、緬甸軍政府、北韓政權等束手無策，而中國也把國家復興形容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證明，這些都使自由主義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面臨危機。新冠肺炎雖然一度令中國在外交上被動，但他們控制疫情、積極推進疫苗外交，對比美國的情況和美國優先保證國民疫苗供應，都令拜登的重返國際舞台的大計起步維難。

結 論

在這場「大國競爭」，尤其是逐漸演化成集團競爭，美國是要步步為營。沒有盟國協調，今天的美國可能有危險陷入冷戰時期的蘇聯的角色，就是競爭戰線不斷延伸，以致最終被拖垮。因為美國作為現役領導國，要提供不少國際的「公共產品」(public goods) 及滿足期望，這和中國，或者中俄結盟所處的情況不同，後者作為挑戰者只需按著自己的目標國、地區、事務範圍，以至時機來決定如何出手。若果南中國海出了狀況，塔利班再度成為阿富汗政府威脅，非洲發生種族屠殺等，美國能不有所行動嗎？不然，國際社會就質疑美國去了哪裡？所以拜登面對的兩難是，要保持經濟實力領先、防止國內政治兩極化，但又要安撫盟國，

爭取國際中間勢力支持，進行主動、積極的外交政策。況且競爭對手不會讓其輕易得手，美國若不盡快恢復活力，前路將越走越難。

中美貿易衝突下的 RCEP^{*}

The RCEP under US-China Trade Conflict

李佳^{**}

Jia Li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4 第六期，頁 15-23。

** 李佳為日本新潟縣立大學國際經濟學部副教授。

中美貿易摩擦自 2018 年 4 月拉開帷幕，雖然 2020 年 1 月中美兩國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大多數的加徵關稅仍然維持在 25%。貿易衝突之外，兩國在通信技術等高科技領域的衝突也在加劇，使得世界貿易及投資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2020 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更是雪上加霜，除了人員和貨物的跨境流動受到限制之外，圍繞口罩、呼吸機等衛生防疫用品的供應鏈過於依賴以中國為首的單一國家、急需重構的聲音更是日益鼎沸。拜登的當選也並不會改變兩國競爭的局面。即便未來取消加徵關稅，兩國經濟摩擦的主戰場早已從關稅轉移到了高科技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自由貿易區戰略已成為中國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舉措。

在中國參與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是規模最大、對確保中國在亞太區域產業鏈及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意義最大的自貿協定。RCEP 由東盟 10 國於 2011 年 11 月發起倡議，邀請中、日、韓、澳、新和印度參加。2020 年 11 月，除印度在外的亞太 15 國在越南河內達成共識，印度則以保護「脆弱」產業為由退出。該協定將於 15 國中至少 9 個成員議會批准的 60 天後生效，其中要至少包括 6 個東盟成員國和中、日、韓、澳、新之中至少 3 個國家。中國商務部於 2021 年 3 月 22 日表示中國已經完成 RCEP 核准，成為率先批准協定的國家，並期待推動協定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實施（央視新聞客戶端，2021）。

RCEP 的特徵

如表一所示，RCEP 成員國 2019 年的名義 GDP 高達約 26 兆美元，占全球的 29%。其中，中國的 GDP 約 14 兆美元，占全球的 16%。RCEP 成員國 2019 年的出（進）口額約 5 兆美元，分別占全球總出口額的 29% 及進口額的 26%。顯然中國經濟在 RCEP 之中特佔據著決定性的份額。此外，從人口角度來看，RCEP 成員人口高達 23 億，占全球人口的 30%。最後，從人均 GDP 的角度來看，RCEP 的成員國之間的差異很大，既有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這樣的高收入並且已經加入 CPTPP 的國家，也有中國、泰國、馬來西亞等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

同時還有緬甸、柬埔寨這樣的低收入國家。換言之，簽署了 RCEP 協定的國家經濟發展水準不同，各個國家在區域生產網路上都有發揮自己優勢的空間。同時，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口步入中產階層，RCEP 的人口規模及多樣性也為區域經濟後續增長提供了動力保障。

表一、RCEP 成員概況：GDP、進出口額、人口（2019 年）

	GDP		出口		進口		人口		人均 GDP (美元)
	億美元	%	億美元	%	億美元	%	百萬人	%	
RCEP	257,636	29%	54,815	29%	49,559	26%	2,303	30%	11,189
中國	142,280	16%	24,995	13%	20,784	11%	1,434	19%	9,923
日本	50,927	6%	7,056	4%	7,210	4%	127	2%	40,144
韓國	16,641	2%	5,422	3%	5,033	3%	51	1%	32,485
東盟	31,735	4%	14,237	8%	13,893	7%	661	9%	4,803
澳大利亞	13,998	2%	2,710	1%	2,216	1%	25	0%	55,542
紐西蘭	2,056	0%	395	0%	424	0%	5	0%	42,978
世界	876,915	100%	189,330	100%	192,632	100%	7,713	100%	11,371

資料來源：UNCTADSTAT

此外，從貿易結構角度來看，RCEP 成員國的貿易增長以中間品貿易為主（表二）。1990 年到 2018 年之間，RCEP 成員國的中間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份額從 41.7% 上升到 51%，中間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份額則從 48% 上升到 52.6%。相應的，1990 年到 2018 年之間，RCEP 成員國的最終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份額從 49.9% 下降到 43.5%，最終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份額則從 32.7% 下降到 27%。顯然 RCEP 的貿易增長是圍繞著區域產業鏈的整合展開的，自 1990 年代對區域內

貿易的依賴性逐步增強。

表二、RCEP 成員國貿易結構變遷 (%)

		出口				進口			
		1990	2000	2010	2018	1990	2000	2010	2018
中間品貿易	零部件	17.6	25.5	23.0	24.5	14.1	24.4	19.8	21.1
	加工品	24.1	22.2	26.2	26.5	33.9	29.1	31.7	31.5
最終品貿易	消費品	29.9	25.8	22.1	20.8	16.5	15.1	11.4	13.8
	資本品	20.0	21.8	22.1	22.7	16.2	15.9	14.3	13.2
原物料		8.5	4.6	6.6	5.5	19.3	15.5	22.8	20.4

(說明：表中數據不含寮國及緬甸)

資料來源：RIETI-TID 2018

RCEP 對中日貿易的影響

RCEP 協定的一大亮點是中日韓之間的關稅減讓安排，特別是中日之間。在所有 RCEP 夥伴國中，目前唯一沒有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就是日本。從關稅稅率角度觀察，在 RCEP 生效之前，中日之間的貿易關稅採用世貿組織規定的最惠國待遇 (MFN) 標準。根據 World Integrated Solution (WITS) 資料庫，2018 年中國出口至日本的商品中有 59.6% 稅目，74.6% 金額的商品免稅，實收平均稅率 3.0%，實收貿易金額加權平均稅率 2.5%；中國自日本進口商品中則僅有 7.8% 稅目，15.8% 金額的商品免稅，實收平均稅率 9.6%，實收貿易金額加權平均稅率 6.1%。根據日本政府 2021 年 3 月公佈的〈關於 RCEP 協定的事實〉一文，RCEP 生效後日本進口自中國的工業品免稅稅目比例將從 47% 上升到 98%；而日

本出口至中國的工業品免稅稅目比例將從 8% 上升到 86%。由此可見，兩國關稅減讓空間較大。

具體來說，中日兩國都顯示出保護國內農林水產品以及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製品的傾向，對肉類、食品、蔬菜、鞋靴、皮革、紡織品／服裝課徵較高關稅（表三）。同時，中國的平均稅率明顯整體高於日本的平均稅率，在工業製品中日本只對鞋靴、皮革以及紡織品／服裝課徵了較高的關稅，其他商品相對應的稅率都比較低；而中國在工業製品中對化工製品、電子電氣設備及其他機械、金屬的平均稅率相對較高，尤其運輸設備的平均稅率達到了 17.4%。也就是說日本出口中國的主要商品目前都面臨著相對較高的關稅。

表三、中日進口商品關稅稅率比較 (%)

	日本進口自中國			中國進口自日本		
	最惠國稅率 (貿易金額加權平均 %)	進口占比 (%)	免稅商品金額占比 (%)	最惠國稅率 (貿易金額加權平均 %)	進口占比 (%)	免稅商品金額占比 (%)
動物肉類	4.5	0.8	11.0	10.3	0.1	0.0
化工產品	2.0	5.8	33.4	5.7	11.2	2.0
食品	11.6	3.1	7.5	19.6	0.4	0.2
鞋靴	30.1	2.0	1.8	18.6	0.0	0.0
燃料	0.9	0.9	31.3	6.7	1.0	0.0
皮革	9.3	1.5	0.8	8.4	0.0	0.0
電子電氣設備及其他機械	0.0	45.4	98.5	3.5	45.5	27.5
金屬	0.9	5.8	71.6	5.6	8.3	7.0

	日本進口自中國			中國進口自日本		
	最惠國稅率 (貿易金額加權平均 %)	進口占比 (%)	免稅商品金額占比 (%)	最惠國稅率 (貿易金額加權平均 %)	進口占比 (%)	免稅商品金額占比 (%)
礦產	0.2	0.5	86.3	3.1	0.1	0.4
其他	0.7	10.7	72.1	6.2	11.4	11.3
塑料、橡膠	3.0	3.4	14.8	7.2	6.3	0.2
土石及玻璃	0.9	1.5	69.1	8.3	2.0	33.9
紡織品、服裝	8.2	12.6	4.4	9.0	1.5	0.0
運輸設備	0.0	2.7	97.2	17.4	10.4	0.0
蔬菜	18.9	1.5	11.5	6.2	0.1	40.0
木材	1.4	1.8	53.5	3.1	1.7	27.1

資料來源：World Integrated Solution (WITS)

RCEP 生效之後，中日之間貿易增長點在哪些部門？比照兩國的承諾關稅表（表四），日本向中國承諾了關稅減讓的商品中，預計影響較大的是皮革、鞋靴、紡織品／服裝。這是因為日本進口的服裝、鞋靴的五成、箱包的四成左右都來自中國，而紡織品／服裝的進口金額龐大，鞋靴和皮革的現行稅率則比較高。中國主要就化學製品、紡織品、家電、汽車及其零部件向日本做出了關稅減讓的承諾。特別是汽車的零部件，會在未來逐步降至零關稅，雖然用於載人的機動車輛會維持現行的 15% 的稅率，但是可以預見日本的相關產業會迎來重大利好。此外，就日本關心的清酒、扇貝等農林水產品的出口，中國也做出了一定妥協，可以預見日本的酒類等消費品將來會以更低廉的價格進入中國市場。

表四、中日兩國承諾的主要關稅減讓項目 (RCEP)

項目		承諾內容	基準稅率 (%)
日本對中國承諾的關稅減讓內容			
石油	揮發性油，煤油，輕油等 (生物柴油除外)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6 年降至零關稅等	2.2-7.9%
	生物柴油	大多數協定生效後第 16 年降至零關稅、部分立即降至零關稅等	
化學製品	無機化學品，有機化學品，塑膠製品等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降至零關稅等	1.6-6.5%
皮革、鞋靴	皮革，皮革製品，毛皮，明膠，動物膠等	協定生效後第 16 年、第 21 年降至零關稅等	2.7-28%
	皮鞋和其他鞋类等	協定生效後第 21 年降至零關稅等	3.4-30%
紡織品	紗線，織物製品，其他紡織品 (服裝除外)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降至零關稅等	2-12.6%
	服裝	大多數協定生效後第 16 年降至零關稅、部分第 11 年降至零關稅	4.4-13.4%
有色金屬	銅，鎳，鋁，鉛，鋅，錫等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第 16 年降至零關稅等	2-7.5%
中國對日本承諾的關稅減讓內容			
化學製品	物理化學試劑，聚氨酯臨時產品，矽膠 (乾燥劑)，抗生素等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降至零關稅	4-6.5%

項目		承諾內容	基準稅率 (%)
紡織品	部分合成纖維（長毛絨）織物，牛仔布，無紡布	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第 16 年，第 21 年降至零關稅	10%
家電／工業機械	塑膠造粒機，自動梯及自動人行道	立即降至零關稅	5%,3%
	推土機，部分家用冰箱／空調／洗衣機，烤箱／微波爐等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降至零關稅	5-15%
鋼鐵／鋼鐵製品	鐵，不銹鋼錠及半製成品，部分鐵或非合金鋼平板軋材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第 16 年、第 21 年降至零關稅	2-6%
精密儀器	牙科微電機等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降至零關稅	4-10%
汽車及其零部件	主要用於載人的機動車輛	承諾自主關稅減免（2018 年 7 月最惠國稅率從 25% 降至 15%）	25%
	履帶式拖拉機，部分發動機零部件、變速箱，部分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的電極和材料、電動汽車電動機等	立即降至零關稅，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第 16 年、第 21 年降至零關稅，關稅減讓	2-25%
其他	盒裝米飯，米果，扇貝（養殖用除外），三文魚，鱒魚，鮮花，清酒等	協定生效後第 11 年、第 16 年、第 21 年降至零關稅	5-40%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2021a, 2021b）內容有刪減

結 語

RCEP 簽署意味著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也意味著世界經濟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當下，RCEP 即是對保護主義的反擊、也是區域化與全球化齊頭並進的象徵。對全球經濟而言，RCEP 或許難以抵消中美貿易摩擦的全部影響（Mahadevan and Nugroho，2019）。但是毫無疑問 RCEP 有助於帶動供應鏈在亞太地區重構與升級。近年來隨著中國用工成本的增長，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勞動密集型工序如組裝加工已經有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等東盟國家的趨勢。未來隨著 RCEP 塵埃落定，新興經濟體如越南、後發國家如柬埔寨將有更大機會融入到區域生產網路中來，跨國企業在亞太地區的佈局未來將會向「中國+」的模式轉變。同時，雖然作為世界的工廠，亞洲國家目前的購買力還不足以支撐起其強大的供給力，但是經濟一體化會帶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而亞太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則會帶來中產階層的進一步擴大，從中長期來看，這將擴大內需，形成區域內經濟增長的良性迴圈。

參考文獻

- Mahadevan, R. and A. Nugroho (2019). "Ca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Minimise the Harm from the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War?" *World Economy* 42(11): 3148-3167.
- 日本經濟產業省（2021a）。《RCEP 協定關於工業製品關稅內容的概要》。
https://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pdf/epa/rcep/gaiyo.pdf。
2021/03/30。
- 日本外務省／財務省／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2021b）。《關於 RCEP 協定的事實》。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15475.pdf>。2021/03/30。
- 央視新聞客戶端（2021）。〈商務部：中國已經完成 RCEP 核准 成為率先批准協定的國家〉，《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3 月 23 日。
<http://cacs.mofcom.gov.cn/article/gnwjmdt/db/rcep/202103/168540.html>。2021/03/30。

2021 年兩會中共對台政策之評析^{*}

Analysis of the CCP's Taiwan Policy in the Two Sessions, 2021

蔡文軒^{**}

Wen-Hsuan Tsai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4 第六期，頁 25-28。

** 蔡文軒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前 言

2021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政協會議（「兩會」），於 3 月 4 至 5 日於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的主軸，似乎是聚焦於經濟議題，包括是審查「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本次兩會，宣示中國已經從新冠肺炎的重災中逐步復甦，並在經濟建設上完成所謂「全面脫貧」的目標。中共有意透過這場會議，再度強化習近平的執政合法性，為他在今年廿大的接班來鋪路。

從兩會觀察對台政策

在對台政策上，較值得注意的重點，包括總理李克強於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九二共識」，要推進「和平統一」，並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保障台人在陸享有同等待遇，及兩岸促融等。不過，部分人士認為「嚴打台獨」等嚴厲措辭並未出現。顯而易見的，這分報告事實上有更多篇幅在處理香港問題，包括如何重新定義港版的「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或「愛國者治港」等方向，而本次在台工作的力度就顯得有些被弱化。

現今中共的對台政策，很大程度可能仍停留在 2019 年習近平「告臺灣同胞書」講話的邏輯（習五條）。雖然有些觀察認為，這說明中共的認知是「時間站在我們這邊」，但這可能也只是說明中方對當前的台灣局勢，根本沒有多想。涉台系統找不出具體「政績」、也沒有更強烈的政治「措辭」，來包裝當前對台政策的蒼白無力。

另一個跡象可以顯示，涉台官員在類似的「面子包裝」工程，已意興闌珊。在今年兩會公告的「十四五規劃」第二十五章部分，內容與描述仍停留在習近平執政初期的惠台措施，近乎老調重彈。如推進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平潭綜合實驗區、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或深化福建作為兩岸示範融合的探索、及台籍青年的築夢計畫等。這類惠台措施，不僅在台灣、甚至是中共官媒報導已遭到廣泛批評，認為對促進兩岸關係的效果極為有限。雖然從後新冠疫情時代的角

度，疫情造成官方的互信基礎薄弱，兩岸關係進入「冰河期」本無可厚非。不過，若中共官方對這類強調兩岸同胞同屬「一家人」、凸顯政府與民間交流差異，也凸顯了中共官方無力改變台海現狀。

兩岸關係並無新的進展

值得重視是，這次兩會報告顯示中共對兩岸關係的認知，趨於悲觀，認為「以經逼政」的政策路線徹底失敗。這反映在其對台灣社會的態度正在進一步改變，對台利機會只會更少。長期而言，這反映中國民間愛國主義崛起的結果，是對港澳、台灣等地，趨於敵視。當然，也無法排除是官方刻意操縱，以規避其在港澳台工作長期以來的管制失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從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角度，站在美方立場，可能傾向海峽兩岸重啟近五年來停擺的官方對話。從中共角度，如何將對話的停擺歸咎於台灣，改善對美關係的「冷戰期」，將是優先課題。就此，我方有必要凸顯中共對台灣社會趨於敵視、與中國愛國主義崛起等問題，對兩岸關係造成的破壞，且審慎應對。

換言之，從本次兩會的觀察來看，兩岸關係在短期內恐仍無突破性發展的可能。首先，兩岸關係似乎在本次議程中被「冷處理」。以習近平在兩會「下團組」為例，6號是到全國政協會議的醫藥衛生與教育的相關團組；7號是來到青海代表團。這些講話與發言的內容，多是對於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以及扶貧建設等相關論述，顯見習在今年的施政主軸，很大程度是放在新冠肺炎的災後重建與避免返貧等議題上。相對的，對於兩岸關係的談話似乎不是重點。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4號的工作報告上的發言，對於台灣部分，主要是闡述將針對「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等開展「調研協商」，但汪洋並未提及具體互動對象。相比較下，去年汪洋對於台灣事務，強調要「深化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各界人士交流交往」，發言力道較之今年要來的強。顯然地，台灣事務在本次兩會的「份量」，似乎有被淡化的現象。

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另一個變數，是中共治港方針的改變。本次全國人大會議以2,895張贊成票，批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的決定（草案）」，將作為中共合法介入香港選舉的工具，港府旋即發表聲明呼應「決定」。此外，中共高調宣示的愛國者治港原則，是建立嚴審候選資格的選制流程，使得民主派難以入選，稀釋民主派的政治能量。這項舉措，很可能使得香港立法機構淪為中共建制派代表的一言堂，從而弱化了「一國兩制」的精神。過去，中共將香港的一國兩制，作吸引台灣民眾支持中國政策的樣板。但在治港方針做了徹底改變後，恐怕加深台灣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的質疑，從而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結 論

在中共面臨所謂「建黨百年」之際，對待兩岸關係可能更以「穩定」為主。中共對台仍保持一貫政策。據此，李克強除重申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的方針，以及反對台獨的基本立場外，更提出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願意與台灣各黨派團體展開對話。事實上，這些言論只是重複過去基調，流於空話而無新意。此外，政府工作報告與政協決議新增「高度警惕和堅決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中共中央是為對台工作畫出明確底線，再三強化話語的約束力道，也為我方設下一層障礙。中共雖無提出明顯的統一時間表，然而其「警惕與遏制台獨」的提法，或將為兩岸關係日後的和平發展埋下隱患。

整體來說，本次兩會的主軸，可能放在對於經濟發展與扶貧建設的重視，以及對於香港政策的調整。在兩岸事務上，中共則似乎有意冷處理。畢竟，在習近平極可能在廿大繼續執政的前提下，兩岸事務保持低調與保守，只要台灣不觸碰所謂的「紅線」，中方將不會對台灣政策進行太多的討論與改變。

緬甸軍事政變的政治基礎*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Myanmar Coup d'État

王文岳**

James W.Y. Wang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4 第六期，頁 29-35。

** 王文岳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緬甸的民主實驗與軍事政變

2015 年緬甸舉行自 1990 年以後首次的全國大選，即使這次的選舉在軍方制定的規則下無法立即改變緬甸威權政治的現實，但由於這是在 1988 年夏天震驚世界的「8888 民主運動」（8888 Uprising）以後首次的全國性大選，全球民主社群投以極大的關注。台灣民主基金會也在那時籌組了緬甸大選觀察團，恭逢其盛。當時擔任觀察員的學者陳佩修院長後來將這個觀選經歷寫成一分深刻的評論，在結語之處說了一段話「緬甸近鄰泰國的軍事政變逆轉民主只是日昨之事，我腦海裡不經意浮現內比都駐軍坦克包圍政府部門與國會的畫面，希望這一幕不要發生」（陳佩修，2015）。這個具有洞見的觀察如同預言般在 2 月 1 日重現；在首都奈比都（Naypyidaw）擔任有氧舞蹈老師的金辛薇（Khing Hnin Wai）在浩蕩空曠的國會大道前搭配著印尼歌手 Tian Storm 的歌曲，唱著「他們來了，一個接一個，爭奪王座」錄製影片時，緬甸軍方的車輛在其身後魚貫駛入已被封鎖的國會，在第三任聯邦議院開議之前發動政變！

軍方政變的魔幻場景如同宋鎮照教授所描述的「柔性（軟式）政變」一般的戲劇性，國務資政翁山蘇姬遭到扣押，百餘位官員遭拘捕，「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發言人苗紐似乎早已知情般的出奇冷靜宣佈翁山與總統溫敏等政治領袖被帶走，年初三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在國防大學視訊會議上宣示 2008 年頒佈的《憲法》需要被捍衛與遵守，軍方在特定情形下，可能有必要廢除《憲法》，乍看之下，軍方政變有跡可循，「這是一齣自導自演的戲碼」（宋鎮照，2021）。

緬甸過往的政治在一世紀的殖民與戰亂之下，對於外界而言，充滿了神秘與不為外界所知的複雜；自從 1988 年，緬甸適逢獨 40 年紀念，緬甸社會已在大學生的領導下，與其他第三波的亞洲國家同步，向軍人爭取民主，此一社會呼聲迫使長年執政的尼溫（Ne Win）將軍請辭，隨後軍方在參謀總長紹貌（Saw Maung）的領導下發動政變，建立「國家法律與秩序恢復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接管國家。在軍方掌控的情形下，由翁山蘇姬

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of Democracy）取得 80% 的國會席次，軍方拒絕承認選舉結果，持續掌權。1997 年，緬甸為了緩解發展的困境，申請加入東南亞國協，為了爭取國際支持，軍政府宣告了「民主路徑圖」，聲稱緬甸可經由舉行國民會議、建立戒律式民主國家（disciplined democratic state）、制定新憲法、全國公投通過新憲法、根據新憲舉行國會大選、召開新國會、選出國家領導人等七個步驟來建立緬甸的民主，然而此一宣告廣受國際質疑（楊昊，2017：236）。到了 2010 年緬甸軍方完成民主路徑圖的前四個步驟，同時軍方核心派系成員組成了「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投入 11 月的選舉，並且在缺乏競爭的情形下贏得近 8 成席位。鞏發黨黨魁登盛（Thein Sein）宣稱民主的緬甸已成不可逆之進程，並且釋放翁山蘇姬取得國際支持，以持續改善緬甸的經濟困境。2015 年的全國性選舉中，翁山蘇姬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取得了將近四分之三以上的席次，自此，緬甸的政治體制已逐步脫離由軍方主導的政治體制，逐漸走向有限的政治競爭體系。然而，此一政治競爭體系中，軍方在現行憲法與制度中仍屬優勢政治勢力，民主政治的空間往往維繫於軍方在民主進程中的利益能否獲得確保，也因此，自 2015 年以後上台的翁山蘇姬必須巧妙地利用她在國際上的聲望與民間的忠誠與軍方進行周旋，以維持全國民主聯盟的執政穩定。

緬甸政治的變與不變：軍人與貪腐

自去年（2020 年）11 月進行大選以後，軍方即對選舉的結果多次提出質疑，國際對於緬甸軍方可能發動政變的傳聞甚囂塵上；因此軍方的政變之舉雖在國際上引起震驚，但並非無跡可循。政變發生以後，緬甸軍方立即進行社交媒體的封鎖與國內社會的管控，但國內仍持續發生民主示威，在本文撰寫的同時，緬甸的政變發展仍在進行中。綜而言之，一般對於緬甸政變的看法主要可由制度及政治經濟兩種方向解。就制度面而言，張傳賢副研究員由制度面指出執政的全國民主聯盟掌控了下院人民院 315 席與上院民族院 161 席，而親軍方的聯邦鞏固發展黨僅有 33 席（張傳賢，2021）；儘管軍方在《憲法》中保障四分之一的國會席次

與掌控內政、國防、邊境事務等三個重要部會，但忌憚再度掌控國會多數的翁山蘇姬勢力恐將擴大憲政改革的正當性，因此自 2020 年 11 月 8 日大選聯邦團結發展黨大敗後軍方在缺乏證據的情形下屢次指責選舉舞弊，質疑新政府的合法性。此外，國際上也認為 64 歲的三軍總司令敏昂萊已屆強制退役年齡，而泰國軍方在 2014 年透過政變掌權亦對緬甸軍方形成政治效應，這可以解釋軍方可能透過政變突襲先發制人以確保權力。泰國朱拉隆功的安全與國際研究所教授 Thitinan (2021) 即支持這樣的看法，但他亦警告緬甸軍方缺乏管理當前經濟的變局，而緬甸政府的技術官僚願意加入軍政府的比例亦低，這些變因均將使軍方政變以後的執政變得困難。

另外一種可能性，則來自於軍方的利益與特權可能受緬甸民主化發展而出現負面影響，如同司徒宇助理教授的評論，期待轉為平民身分的敏昂萊見鞏發黨的支持率未達一成，難有再起機會，然而緬甸軍方向來以國家的守護者自許，聲稱軍方才是唯一能確保國家不因內憂外患的唯一憑藉；而緬甸的發展被學者稱為「戒律式民主」(disciplined democracy)，由民選領袖與軍方分享權力，2017 年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仰光省首席部長(相當於省長)漂敏登(H.E. U Phyo Min Thein)即曾批評國防軍(Tatmadaw)總司令敏昂萊的職位僅是司長等級即遭到軍方的強烈反彈(司徒宇, 2021)。

自 1990 年代以來，緬甸進行改革，對初級商品生產與重工業部門的國有企業進行民營化改革，軍方一方面成立控股公司「緬甸經濟控股公眾有限公司」(Myanmar Economic Holding Public Company Ltd)，掌控重要民生物資的生產，並且選擇政治上的忠誠企業主承接經營，名之為培養「國家企業家」(national entrepreneurs)，以維持軍方對於金融、石油、天然氣、旅遊等主要資源部門的掌控(Simpson, 2014)。加上軍方掌有地方軍區軍事首長的任命，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緬甸發展項目，舉凡中緬邊境貿易、基礎交通建設、開發貸款，均需與緬甸軍方接觸。長期發展的結果，使得以軍方關係所建立的親信資本主義迄今仍然左右緬甸的政經利益分配，軍方將領與軍官在國會與官僚組織上仍保有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緬甸軍方與中國的關係不同於泰國，北部的少數民族武裝衝突多有受到中國支持，也因此緬甸軍方不能完全忽視西方的影響。

在這種情形下，翁山蘇姬必須在維持與軍方的關係下進行政經改革。然而，在全國民主聯盟執政的第一個任期而言，即使作為國務資政的翁山被嚴厲批評為缺乏具有執政能力的政治家，但在緬甸人民全心託付的信任下，緬甸的外來經濟援助、外資投資與國際參與出現了迥然不同的鉅變，即使在國際間因惡劣的人權紀錄而如同「賤民國家」（pariah state）般被排斥的緬甸軍頭都獲得了出訪外國的機會，自 2016 年以後，敏昂萊即訪問了中國、日本、印度和俄羅斯等國家。然而，在缺乏足夠的執政人材之限制下，翁山在各項職位的任命上往往取決於對她的個人效忠，而非真實的政治能力，再加上她拒絕分享權力給緬甸其他的民主勢力，使得全國民主聯盟的執政成績乏善可陳。即使她所依恃的國際聲譽亦因她將追求族群整合作為優先施政要項，依賴先前登盛與少數民族武裝組織所簽署的彬龍會議簽署的停火協議維持和平，在當前的和平進程的發展並非平順的情形下衝突加劇，反而鞏固了軍方的政治影響力（施欣妤、孫采薇，2020）。結果，在文武關係均衡難以維持與民主治理失能的情形下，透過有限形式的民主選舉打開軍方主政的機會之窗已然關閉的情形下，軍方在缺乏正當性的情形下，顯然對於持續獲得維持自身利益的前景感到悲觀，政變乃成為軍方捍衛自身利益的選項。

國際反應與微弱的民主之光

國際上曾被視為「民主女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之聲譽已然受損，然而在地緣政治下，緬甸政變的前景仍然混淆，對於緬甸影響力最大的中國與印度，均避免立即反映，由中國的角度而言，處於中印之間的緬甸具有高度戰略價值，擴大對緬的政治影響力，仍為主要的戰略目標，有傳聞中國外長 1 月訪問緬甸時，軍方曾向中方透露政變的訊息，儘管此一傳聞難以被證實，但如果此一傳聞為真，後政變時期聯合國與西方國家對緬甸進行經濟制裁的情形下，中國將成為未來緬甸軍方必須合作的少數選項。

在緬具有影響力的歐洲與澳洲，亦可能將緬甸視為美國拜登政府以民主與人權作為外交政策核心的宣稱是否可信的測試，先前美國早已針對緬甸參與羅興亞暴行的高級軍官實施制裁，敏昂萊則名列其中；有一種較少被提及但仍具可能性

的政變解決方案是重回 1991 年聯合國主導的「柬埔寨模式」，當時在法國與印尼的推動下，美國、蘇聯、越南、東協與印度均涉入柬埔寨開放後的重建，然而當前緬甸的政治情勢不同於當時的柬埔寨，穩定緬甸政局較不需要多邊性的國際參與，倘若印尼等東協國家有意願承擔此一責任，美國、中國、印度、孟加拉的態度將具有指標意義。

政變以後，緬甸公民社會展現了對於軍政府的不滿，夜間的敲壺打盆驅邪抗議、專業醫療團體的公民不服從宣示、接連數日的街頭遊行與大規模的抗議人潮反映了緬甸公民社會對於軍方的反感，仿效泰國民主運動的三指手勢亦反映了緬甸青年在承接全球新興抗爭浪潮上的決心。長期治理失能的緬甸因為軍事政變重新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緬甸十年的民主實驗宣告失敗，然而政變之善後重新召喚了歷史，重現了權力鬥爭的殘酷與現實利益的算計。

參考文獻

Simpson, Adam (2014). "Market Building and Risk under a Regime in Transition: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 Myanmar (Burma)." In Toby Carroll and Darryl S.L. Jarvis (eds.), *The Politics of Marketising Asia* (pp. 162-18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hitinan Pongsudhirak (2021). "Myanmar's Military Will Struggle to Hold On to Power." *Nikkei Asian Review*, February 3.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Myanmar-s-military-will-struggle-to-hold-on-to-power>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1).

司徒宇 (2021)。〈一路向南：2021 緬甸軍事政變成因剖析〉，《自由時報》，2 月 3 日。<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430653>。2021/02/17。

宋鎮照 (2021)。〈難擺脫軍事政變的緬甸民主之路〉，《蘋果日報》，2 月 2 日。<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202/SYZHHJQUYNHWPO3HL4WAXE6JTM/>。2021/02/17。

施欣妤、孫采薇 (2020)。〈緬甸克欽族的族群衝突與管理 (1994 ~ 2015)〉，洪泉湖 (主編)，《當代亞洲民族問題》，頁 255-274。台北：五南。

- 張傳賢（2021）。〈軍方干政——緬甸的必要之惡〉，《蘋果日報》，2月4日。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204/HWWOIPDMDVDJJGRMFNTJATZUUM。2021/02/17。
- 陳佩修（2015）。〈超 A 評論——民主女神與人間政治：緬甸大選觀選後有感〉，《自由時報》，11月27日。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522302?fbclid=IwAR1NBQ1Kx-RJCHrPq-fjw90aMgdhuvxyb2m_kT52Jm6a1vc9qwOCTfQnbfo。2021/02/17。
- 楊昊（2017）。〈緬甸政治發展與民主改革：優勢政治勢力的延續或轉型？〉，孫采薇、吳玉山（主編），《優勢政黨與民主：亞洲經驗的省思》，頁 223-249。台北：五南。

初探美中對緬甸軍事政變之回應^{*}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Myanmar's Military Coup

司徒宇^{**}

Yu Szu-Tu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4 第六期，頁 37-41。

** 司徒宇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2020年11月8日，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及其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以下簡稱「全民盟」）在「個人能力」與「執政成績」皆備受外界質疑的情況下，再度於議會選舉中以壓倒性的席次擊敗緬甸眾反對黨，不僅蟬聯國會第一大黨，更延續其自2015年大選所取得的完全執政優勢。相較於五年前的大選，全民盟在2020選舉中更上層樓，囊括「可選舉議席」中超過八成（83%）的席次；而代表軍方陣營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下簡稱「鞏發黨」）在選前雖力圖於「經濟」和「國安」議題上展現實力，以奪回民心，但結果卻是差強人意。鞏發黨獲得較2015年更差的成績，只拿到約7%的席位，顯示緬甸人民對軍方仍充滿不信任感，即便翁山蘇姬民主女神的光環已相形黯淡，全民盟第一任期政績也乏善可陳，卻都無法為軍方增加選票，代表過去深植民心的獨裁統治陰影很難被輕易抹去。

然而，就在新國會議員準備於今年（2021）2月1日就任，並選舉新內閣的清晨，緬甸軍方重蹈1962年尼溫將軍（Ne Win）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文人政府的覆轍，先以去年選舉有重大舞弊導致國家分裂為由，拘禁包含國務顧問—翁山蘇姬與總統一溫敏（Win Myint）在內的政府高層官員和全民盟幹部（後續更試圖以荒謬罪名，如違反「進出口法」、「天然災害管理法」，起訴翁山蘇姬和溫敏），再宣佈正式接管政府，國家進入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此期間由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掌權，原身為軍系代表的副總統敏瑞（Myint Swe）擔任代理總統。除此之外，軍方旋即在政變後二天罷免了24名部長及副部長的職務，並重新任命11名新部長，職位除原本按照2008年憲法保障給軍方指派的國防部長、內政部長與邊境事務部長外，另包括財政部長、衛生部長、外交部長、訊息部長等重要職位；軍方還強制要求新選舉產生的國會議員於24小時內離開首都—奈比都（Naypyidaw）。前述漠視民主、強行奪權的舉動，讓緬甸國內與部分歐美國家在事發後的一天之內，皆發表聲明定調此次事件為「軍事政變」。

在緬甸國內，伴隨政變而來的，是全國多處通訊系統被中斷、奈比都道路被封鎖、糧食搶購潮湧現、人民暗夜敲碗鍋、鳴喇叭以示抗議，並且發起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消息，社會一時風聲鶴唳。而國際社會的表態則不太一致，但大體可分

為「不予譴責」和「強烈譴責」二派：首先，中國是「不予譴責」陣營的代表，他們的聲明僅表示，希望緬甸各方能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妥善處理分歧，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其他如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東協國家也認為，政變為緬甸內部事務，不打算干涉。再者，美國則站在「強烈譴責」的立場，聲稱他們將針對相關制裁採取必要評估與適當行動，以捍衛民主；而英國和歐盟領導人也在事發之初，即定性此為軍事政變，並對緬甸軍方非法拘禁領導人物的手段加以嚴厲譴責。而國際社會為何有如此分歧的反應？相當值得深入探討，但本時評礙於篇幅，將簡要闡述中、美二國近期與緬甸軍方的交往關係，以藉此釐清前述分歧反應之成因。

中國與緬甸軍方關係

2011年，擁有軍方背景的登盛（Thein Sein）就任緬甸總統後，出人意料地採取諸多措施以實行改革開放，不但讓許多機構與學者認為緬甸有逐步走向開放的趨勢，也讓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12年旋風式地訪問緬甸，表達對該國進行民主改革的支持；其後，歐巴馬更於2016年（全民盟政府上台後）解除對緬甸長達19年的經濟制裁。但是，在2011年之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緬甸幾乎沒有任何交往，緬甸一直以來最重要的外交國家就是中國。

從區域位置來看，緬甸對中國向西南的開放與發展，佔有極重要的經濟與戰略地位，因此中國也一直將緬甸視為區域建設的關鍵夥伴。中緬二國於2019年初正式動工的「共同建設經濟走廊」計畫就是最好的例子，計畫內容包含許多重要的項目：皎漂深水港、昆明至皎漂鐵路建設、木姐至曼德勒鐵路建設、新仰光造鎮發展計畫、克欽邦與撣邦邊境經濟特區，以及密松大壩重啟案。然而，誠如學者何清漣所言，即便翁山蘇姬自2016年開始以凌駕總統之姿治理緬甸，並於就任頭一年即訪問中國，希望就緬北內戰問題向北京尋求解決之道，後續也用支持一帶一路換取中國對緬甸民族和解行動的支持；但中方對緬交往的策略始終是「兩邊下注」，並未放棄與軍方保持密切聯繫。

先以 2019 年 4 月敏昂萊的訪中行程來說，此次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親自會見，雙方不僅就戰略合作與緬北形勢等軍事安全議題進行交流，還討論了一帶一路建設與中緬邊境貿易的發展狀況。再到 2020 年 7 月，中國駐緬大使—陳海也在奈比都與敏昂萊就中緬經濟走廊建設交換意見，並獲得軍方正面支持。今年 1 月中旬，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緬甸時，不僅與溫敏、翁山蘇姬進行會談，也和敏昂萊會面。前述案例，足以代表中方對敏昂萊的重視，也瞭解國防軍總司令的權力影響範圍絕不僅限於軍事層面，要在緬甸推行任何重大發展計畫，都無法缺少敏昂萊的支持，否則將窒礙難行。另外也相當程度解釋了，為何中國對此次軍事政變採取「不予譴責」的姑息態度。

然而，此處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看重與緬甸軍方的交往，絕不代表中國支持甚至暗助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其實緬甸局勢動盪也非中方所樂見，中國真正在意的是自身利益獲得確保，因此必須和緬甸未來所有「可能」的領導班底（無論是民選或者軍方政府）維持友好關係。這樣的態度與 2017 年緬甸因羅興亞議題在國際上被孤立時，中國展示的態度完全相同。

美國與緬甸軍方關係

1988 年，緬甸軍方對反政府示威活動進行殘暴鎮壓所引發的「8888 學運事件」，以及 1990 年軍方拒絕承認國會大選結果，這二起事件讓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因考量緬甸人權情況惡劣，乃下令暫停對緬甸的優惠性貿易措施，而後美國更於 1997 年開始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這樣的情況直到 2016 年歐巴馬主政時期，有鑒於緬甸民主轉型進展順利，將近 20 年的經濟制裁才宣告解除，雙方當時也進一步就緬甸的法治、人權、貪腐等問題發表合作聲明。很明顯的，在此之前美國與緬甸軍方不太可能有任何實質接觸，即便是 2016 年以後，美國的主要交往對象也是代表民主派的翁山蘇姬（全民盟）政府。

到川普（Donald J. Trump）執政時期，美國國防部才首次與緬甸商討軍事合作關係，為緬甸軍方提供國防改革、軍事醫藥、人道援助方面的培訓。另外，美國也首次邀請緬甸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 2020 年的「金色眼鏡蛇演習」，這是東

南亞地區最大規模的聯合軍演，過去緬甸一直是假想敵目標，如今卻受邀參加，美國背後之目的即為「劍指中國」，希望離間中國與緬甸軍方長期以來的緊密關係。但無論如何，美國與緬甸軍方的關係絕不若中國親近，再加上美方長期自詡為民主自由的支持者，面對此次政變，拜登（Joe Biden）不僅已發表三次譴責聲明，呼籲國際社會團結一致，迫使緬甸軍方立即放棄非法奪取的權力；另外，從政變發生後，美國就不再與緬甸軍方進行直接接觸。

因此，有分析指出，美國針對政變的發言與後續經濟制裁的行動，不單會讓他們對緬甸的影響力下滑，近年重建的美緬關係亦將生變，更重要的是，恐怕會迫使緬甸軍方更加向中國靠攏。換言之，軍方勢力抬頭可能給中國創造更多機會，提升對緬甸的影響力，這將是拜登政府施行制裁前需要審慎評估的層面。

參考文獻

- 中央廣播電臺（2021）。〈美國認定緬甸軍事政變 第一步先斬斷援助〉，《中央廣播電臺》，2月3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0812>。2021/02/06。
- 司徒宇（2021）。〈2021 緬甸軍事政變成因剖析〉，《自由時報》，2月3日。<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430653>。2021/02/06。
- 何清漣（2021）。〈緬甸軍事政變對美中關係的影響〉，《上報》，2月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6045。2021/02/06。
- 張育軒（2021）。〈挺不挺緬甸政變 中國面臨的尷尬難題〉，《上報》，2月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6031。2021/02/06。
- 鄭之翔（2016）。〈翁山蘇姬訪美行：歐巴馬宣布解除對緬經濟制裁〉，《關鍵評論網》，9月19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9540>。2021/02/06。
- 環球網（2019）。〈美欲通過合作控制緬甸軍隊 促使緬徹底脫離中國〉，《環球網》，12月24日。<https://m.sohu.com/n/361356642/>。2021/02/06。



|| 研究論文 ||

Chinese Spies' Infiltration in Taiwan*

中國間諜對台灣的滲透

Jun-deh Wu**

吳俊德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1.04 第六期，頁 45-65。

** 吳俊德為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some historical stories of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Kuomintang (KMT). It shows that CCP's spies not only saved the party from being hunted down by the KMT in its initial stage, but also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winning the civil war. After the KMT government retreated to Taiwan, the CCP continued using the same tricks. The infiltration of Chinese spies in Taiwan intensified after Taiwan became a democracy and opened up the restrictions on cross-strait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iques applied by Beijing to collect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illustrates these techniques with example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ome other important cases from the most recent ten years. Finally, the conclusion describes the counter measur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Code,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the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Beyond these amend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aiwan's government must strengthen the patriotism of its citizens.

Keywords: Chinese spies, infiltration, military intelligence, patriotism

Introduction

Intelligence is a critical factor in war. The party with more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on its opponent gets the upper hand, even if its military capability is relatively weaker. This is because the better informed party can take measures in advance to reduce potential damage from actions by its opponent. There are various methods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Among them, human intelligence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For intelligence, timing is every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ypes of intelligence, the reliability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from human intelligence is likely to be better. Human intelligence is largely obtained through spies. Therefore, the successful infiltration by spies into the enemy circle is the key to survival of a political entity at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knows this principle very well. When the CCP was founded in Shanghai in 1921, it was a clandestine organization since it aimed to overthrow the Nationalist Party (Kuomintang, KMT) and to establish a regime ruled by workers and farmers. Immediately after its birth, the CCP faced the crisis of being hunted down by both the KMT and the French and British in the Shanghai Concessio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party development and to escape persecution, Zhou Enlai (周恩來), the future prime minist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set up the Central Committee Special Branch (中央特別行動科) in Shanghai on November 11, 1927. This unit was the first CCP secret service (Faligot, 2019: 1). The missions that Zhou Enlai assigned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Special Branch were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to protect CCP leaders from being arrested by the KMT, and to punish or assassinate defectors. The approache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were to “break in” and to “pull out”. “Breaking in” means to dispatch spies to infiltrate into the KMT. “Pulling out” means to recruit KMT party members as agents.

In 1931,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pecial Branch, Gou Shun-chang

(顧順章), was captured in the Wuhan (武漢) Area by KMT's secret service of the Central Investigation Branch (中央調查科). Gou Shun-chang then defected to the KMT. He agreed to provide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CCP leaders in Shanghai, and the list of CCP agents inside the KMT. But there was one condition. He would only do so in front of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the KMT's highest leader in Nanjing. Gou Shun-chang warned KMT agents in Wuhan not to reveal his arrest to any KMT officials before he arrived in Nanjing, since the KMT was full of CCP spies. However, KMT agents in Wuhan still sent classified messages through telegram to Hsu En-tzeng (徐恩曾),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vestigation Branch in Nanjing.

As expected by Gou Shun-chang, Hsu En-tzeng's confidential secretary, Chien Zhuang-fei (錢壯飛), was a CCP agent. Although Chien Zhuang-fei was not authorized to deal with classified messages, he read the messages and reported to his handler right away. After receiving this intelligence, the CCP took emergency measures immediately. First, Zhou Enlai mobiliz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Special Branch to move CCP offices in Shanghai to other places within one day. Second, any CCP member that could be traced by Gou Shun-chang withdrew from Shanghai. Third,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ciphers were renewed. When the KMT's Central Investigation Branch took actions after Gou Shun-chang arrived in Nanjing and handed in information, everything was gone. Only a few communists were arrested by the KMT (翁衍慶, 2018: 第一章).

Gou Shun-chang's defection could have allowed the KMT to seize important CCP officials and to crush the CCP's organization in Shanghai. However, a CCP agent inside the KMT changed the entire story. After the CCP overthrew the KMT's rule in mainland China, Zhou Enlai admitted that were it not for Chien Zhuang-fei, he and many CCP leaders would have die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CP would have be rewritten. He regarded Chien Zhuang-fei as one of the three heroes in the CCP's early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civil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the nationalists, CCP spies also played a decisive role. When the KMT created its military school, the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黃埔軍校), to build its own force in 1924, the CCP sent spies to study and work there.¹ It is said that among the 600 students in the first year, fifty to sixty were communist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CCP continued to send students to the academy. Despite the KMT having ousted communists in its “party cleansing” action, there were still a certain number of spies hidden in the KMT. Ten years later, before the CCP initiated the civil war, some of its spies were promoted to become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KMT’s army (翁衍慶 , 2018 : 25).

Three KMT military officers who were indeed CPP agents are of exceptional importance. They are Kuo Ruo-huai (郭汝槐), Liu Fei (劉斐), and Han Lian-cheng (韓練成). Kuo Ruo-huai joined the CCP in 1929. After 1945, the year in which CCP began to rebel,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Office for Operations and later the Office for Planning in the KMT’s army. In a decisive battle known as the Hsu-bon Campaign (徐蚌戰役), Kuo Ruo-huai made the war plan and leaked it to the communists in advance. This battle wa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civil war, in that the KMT’s army lost a half million soldiers and over one hundred generals.² The CCP claimed that Kuo Ruo-huai’s military intelligence had an immeasurable effect on the liberation war.

Liu Fei became a communist while studying in Japan. After 1945, he served in the KMT military committee as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He provided the CCP with the KMT’s military deployment and war plans in numerous battles. The CCP’s chairman Mao Zedong (毛澤東) once said that Liu Fei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beration war. The CCP’s victory resulted from his intelligence. Han Lian-cheng was recruited by Zhou Enlai in 1946. He became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advisor in 1947. Han Lian-cheng not only passed war plans to the CCP, but also gave false information to Chiang Kai-shek, which led him to make wrong decisions. After Han Lian-cheng escaped from

1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was “Kuomintang Military Academy”. People called it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because it was located in Huangpu (Whampoa). This school eventually became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litary Academy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2 The CCP named this battle the “Huaihai Campaign” (淮海戰役).

the KMT, Mao Zedong told him that the CCP could command the KMT's troops just because he was next to Chiang Kai-shek.

One female civilian, Shen Anna (沈安娜), is noteworthy. She was recrui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Special Branch and later entered the KMT, working as a stenographer in 1935. Due to her excellent performance, after 1939, she became Chiang Kai-shek's primary shorthand typist. She attended and recorded all of the meetings Chiang Kai-shek chaired. Needless to say, with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hen Anna, Chiang Kai-shek was effectively living in a glass house where the CCP could see his every move. Shen Anna worked for the KMT for fourteen years. The CCP called her "the one who holds Chiang Kai-shek's pulse" (翁衍慶, 2018: 第二章).

As revealed in these examples, the CCP's survival and its victory in the civil war were heavily tied to its spies and agents. In the initial stage, Chien Zhuang-fei saved the CCP from being hunted down. During the civil war era, although the CCP's army were outnumbered by more than ten to one, intelligence collected by numerous agents helped the communists defeat the nationalists. The KMT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Since then, Taiwan has maintained its self-ruling status and became a vibrant democracy in the 1990s. The CCP regards Taiwan as a part of China and refuses to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Unification with Taiwan remains the "core interest" of Beijing, and the CCP never gives up the idea of using military force to fulfill this goal. From its own experiences, the CCP knows very well that human intelligence gathered from the inside was a key element in the struggles against the KMT. Beijing continuously makes efforts to infiltrate Taiwan to collect military intelligence.

Tradecraft

After the KMT government retreated to Taiwan, neither sid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recognized the other as a legitimate government. There was neither contact

n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until Taiwan lifted its martial law and allowed people go to China to visit family members in 1987. From 1949 to 1987, Taiwan and China had remained separated for thirty-eight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for Beijing to send spies to Taiwan. Therefore, Beijing could hardly employ the same trick to Taiwan as what the CCP did to the KMT when mainland China was ruled by the KMT government.

After Taiwan initiated its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90s, and due to economic downturn,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people went to mainland China to run businesses or to seek employment. As the demand increased, restrictions on cross-strait exchanges were gradually relaxed. For example, indirect fligh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ere launched in the early 2000s. Although direct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were still prohibited at that time, Taiwanese people went back and forth across the strait more frequently.

In 2008, KMT candidate, Ma Ying-jeou (馬英九),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in Taiwan. President Ma'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 much more friendly than his predecessors, Lee Ten-hui (李登輝) and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In the same year after his inauguration, Ma Ying-jeou realized the "Three Direct Links", that is, direct transportation, trade, and mai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Moreover, due to the sharp decline in birth rates starting in the late 1990s, Taiwan's universities faced the threat of insufficient enrollments.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college students from China have been welcome to study in Taiwan. The loosened regulations on tourism, academic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impro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ronically, these warming ties provided Beijing with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infiltration and source recruitment in Taiwan (Cole, 2015).

When Taiwan and China were completely separated, Beijing's secret services virtually had no access to Taiwan's military officers on the island. The only way to contact and recruit a Taiwanese military officer was to proceed in a third location

outside of Taiwan or China. Therefore, the military attaché assigned to a Taiwan embassy in a foreign country became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Beijing. Here, Lo Hsien-che (羅賢哲) is the most infamous case. Army Colonel Lo Hsien-che was dispatched to Thailand as a military attaché in 2002. His lust for women made him a target. Beijing sent a female agent, Li Pei-chi (李佩琪) to approach him. As anticipated, Lo Hsien-che fell into this sex trap. Starting from 2004, he began to provide Beijing with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lthough he was redeployed to Taiwan in 2005, he still found a chance to meet Li Pei-chi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nded intelligence to her. Lo Hsien-che was promoted to major general in 2008. His case was unveiled in 2011, and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Shen, 2018: 1-4; 翁衍慶, 2018: 121-122).

Lo Hsien-che's case had profound effects. He used to work in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for Intelligence (J-2), and was therefor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fter he was promoted to major general, he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army's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department.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o-sheng" (博勝) program, which aimed to strengthen Taiwan's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nfrastructure. Therefore, Beijing might have in hand Taiwan's capabilities in battlefield management and awareness. Moreover, Lo Hsien-che was a high-ranking officer. His defection eroded trust in Taiwan's military. This may hamper Taiwan'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arms procurement (沈明室, 2011).

After Taiwan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exchanges between people across the strait, it has become very easy for an intelligence handler to come to Taiwan. Chinese spies and handlers can enter Taiwan under the identity of tourists, businessmen, scholars, journalists, or even students. After Chinese spies enter Taiwan, there are basically two ways for them to collect military intelligence. One is to conduct field surveys and the other is to develop a spy ring.

Field survey involves going to places nearby military bases or restricted areas to

perform reconnoitering operations. They may either conduct terrain reconnaissance for a specific military base, or to observe a military drill from a distance. For instance, Jioupeng (九鵬) base in Pingtung (屏東) is one of Taiwan's sensitiv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where advanced guided missiles are tested.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in recent years, every time a live-fire test is scheduled, independent tourists from China would appear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These tourists pretend to wander around but take close-up pictures with sophisticated photography equipment. Sometimes they even "play" with drones that have cameras (Pan, 2015a). These "tourists" are obviously doing things related to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rather than sightseeing. In short, Beijing exploits the opportunity of open and independent travel to conduct espionage activities. It can be sure that a certain number of tourists from China are real spies.

The second way for a Chinese spy in Taiwan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is to develop a local spy ring. This requires the handler to stay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or to travel to Taiwan frequently. Here, Zhen Xiaojiang (鎮小江) is a typical case. Zhen Xiaojiang used to be a military office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After he became a permanent resident in Hong Kong, he disguised himself as a businessman. From 2007 to 2012, he came to Taiwan frequently. He used free travel, gifts, or even cash to cultivate sources in Taiwan's military. He successfully recruited Hsu Nai-chuang (許乃權), a retired army major general to join his spy ring. Then, Hsu Nai-chuang introduced other current or retired Taiwanese military officers to Zhen Xiaojiang. In several years, Zhen Xiaojiang developed a spy ring consisting of more than ten people including a former air force pilot. These people collected intelligence on the Mirage 2000 jet fighter, Han-kuang Exercise (漢光演習), and Taiwan's long-distance early-warning radar system. Taiwan has never seen a spy network as large as Zhen Xiaojiang's. He was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and Hsu Nai-chuang was sentenced to two years and ten months (謝君臨, 2017; 周敏鴻, 2018).

In addition to sending spies or handlers to Taiwan, Beijing also adopted

an indirect approach to collect human intelligence in Taiwan. That is, to recruit Taiwanese people who run businesses or work in China as agents. The priority targets are those who used to serve in Taiwan's military since they have access to current military officers. After a Taiwanese is recruited, he is asked to go back to Taiwan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or develop a spy ring. This approach has at least two advantages. First,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is carried out in China. This makes things much easier for China's secret services. Under this approach, the most important job of China's secret services is locating adequate targets and identifying their weakness. Second, the number of spies sent to Taiwan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is can prevent their agents from being arrested by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ies. It can also prevent their agents from betrayal in Taiwan. By doing so, Beijing lowers the risk of its espionage operation.

China's secret services use both carrot and stick to recruit Taiwanese people. The most common way is to provide monetary rewards to those who collect intelligence. The reward does not have to be in cash. For those agents who run businesses in China, it can be tax exemptions or other benefits such as less inspection on fire-fighting installations. The second way is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pay for legal infractions. Some Taiwanese commit a crime and are caught in China. China's secret services may offer deals for these people to expiate their criminal case. They can choose to become spies in exchange for probation or non-prosecution. The third way is to set a trap. China's secret services usually use money and sex as bait. Once people fall into the trap of an extramarital affair or civil dispute, it is easy to exploit them.

This approach can be illustrated by Chen Wen-jen (陳文仁) and Yuan Hsiao-feng's (袁曉風) case. Chen Wen-jen used to be an air force lieutenant who retired in 1992. After retirement, he went to China to operate a business. He was recruited by 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2PLA),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ng Taiwan's military information. The 2PLA instructed him to return to Taiwan and develop a spy ring. Chen Wen-jen successfully

persuaded Yuan Hsiao-feng, his former colleague who still served in Taiwan's Air Force, to join him. From 2003 to 2007, Yuan Hsiao-feng stole classified military information and saved these documents in flash drives for twelve times. These flash drives were sent to Beijing by Chen Wen-jen. Yuan Hsiao-feng was retired in 2007 as a lieutenant colonel. He was paid NTD\$7.8 million (USD\$260,000) in total by Beijing. After retirement, Yuan Hsiao-feng and Chen Wen-jen made efforts to recruit other former colleagues as new sources of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military officers they contacted refused to betray their country and reported to Taiwan's counter-intelligence units. Chen and Yuan's espionage activities were finally disclosed. In 2013, Yuan Hsiao-feng was given twelve life sentences while Chen Wen-jen received a 20-year sentence (Cole, 2013; 翁衍慶, 2018 : 167).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when retired Taiwanese military officers visited China, especially for those from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hey were often forced to "interview" with China's secret services. During the interviews, they were asked to provide military information or intelligence that they knew. These people had not done anything wrong nor violated any regulations. They were targeted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connected to Taiwan's military. If they did not cooperate with China's secret services, they might be threatened and detained for hours or days. Sometimes even the family members traveling together with them were intimidated as well (翁衍慶, 2018 : 22). The coercive means applied to recruit Taiwanese people as agents is appalling and inconceivable. China's secret services act unscrupulously as if taking the law into their hands.

Other Important Cases

There is one case worthy of mention. In 2004, Lo Chi-cheng (羅奇正), a Taiwanese Military Intelligence Bureau (MIB) lieutenant colonel, recruited Lo Pin (羅彬), a Taiwanese businessman as an agent, and sent him to China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In 2006, Lo

Pin was exposed and arrested by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He was made to pay for his espionage behavior. Under torture and cruel treatment, needless to say, Lo Pin could not help but agree to become a double agent. After Lo Pin returned to Taiwan, in reverse order, he recruited his boss, Lo Chi-cheng, to work for Beijing. From 2007 to 2010, Lo Pin delivered the intelligence stolen by Lo Chi-cheng to a Chinese handler in Hong Kong. Lo Pin also brought fals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Beijing back to Lo Chi-cheng, who in turn passed these materials to MIB as part of his efforts (Pan, 2015b).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foun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Lo Chi-cheng problematic in 2009. After one year's investigation, Lo Chi-cheng was arrested in 2010, several months after he was promoted to colonel. Lo Pin was also arrested and later sentenced to three and half years. Originally, Lo Chi-cheng was given a life sentence by the Military High Court in 2011 for his defection and corruption. Due to a series of military reforms initiated in Taiwan in 2013, his cas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 In 2015, he was eventually sentenced to eighteen years. His rewards of USD\$125,000 and HK\$1.05 million from espionage activities were confiscated as well (項程鎮, 2015b). Lo Chi-cheng's case was serious because he ran a spy ring in mainland China (Pan, 2015b). His betrayal damaged Taiwan's capability in collecting human intelligence in China.

Another infamous case is Ko Cheng-sheng (柯政盛). Ko was a vice admiral retired as the commander of Taiwan's Education, Training and Doctrine Development Command in 2003. Ko Cheng-sheng's friend, Shen Ping-kang (沈秉康) was a Chinese agent. From 1996 to 2007, Shen Ping-kang arranged several free trips to Australia and China for Ko Cheng-sheng, and introduced him to Chinese intelligence officers in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nd the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Mattis, 2014). Ko Cheng-sheng agreed to develop a spy ring in Taiwan's navy for Beijing. From 2008 to 2011, Ko Cheng-sheng and Shen Ping-kang invited two Taiwanese navy rear admirals to travel to Australia and meet Chinese intelligence officers. But the

two rear admirals refused to defect. Ko Cheng-sheng was sentenced to fourteen months, and Shen Ping-kang was given a one-year sentence in 2015 (項程鎮、鮑建信，2015；林偉信、呂昭隆，2015). It seems that Ko Cheng-sheng did not leak any important intelligence to Beijing. However, he is the highest-ranked Taiwanese military officer who was sentenced for espionage behavior.

In addition to Ko Cheng-sheng, there was one more top-ranking military officer suspected of spying for Beijing. Chen Chu-fan (陳筑藩) was lieutenant general retired as the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Military Police Command. Chen met Chinese intelligence officers in China after he was retired. He then introduced Chen Shu-long (陳蜀龍), a major serving in the MIB, to China's secret services. Chen Shu-long submitted intelligence to Beijing several times. He also lured an acquaintance who had served in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to travel to China. The acquaintance was thereby interrogated for three days by China's secret services. Both Chen Shu-long and Chen Chu-fan were caught and prosecuted for spying. The former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2014. But the latter was rendered innocent in 2016, due to insufficient evidence (項程鎮，2014；楊國文，2016).

Chiang Fu-chung (蔣福仲) is another recent case in which a Taiwanese military officer was given a life sentence. Chiang was an air force captain serving in an 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He stole 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passed them to his uncle who operated a business in China. Since Chiang Fu-chung was familiar with Taiwan's air defense system and radar parameters, there were great concerns that high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had been leaked to Beijing. Throughout the trial, Chiang Fu-chung refused to admit his guilt.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the final verdict in 2015 (項程鎮，2015a；項程鎮，2015b).

The most recent case happened in 2019. Two defense contractors, surnamed Chang (張) and Lin (林) were charged with spying for China on September 2.³ Since

3 The full names of the two suspects were not revealed.

2016, their firm had bidden on public tenders and obtained numerous contracts from Taiwan'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While Chang and Lin wer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y frequently treated military officers who undertake these cases to dine with them. After they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se military officers, they began to make inquiries about sensitive information. Some military offices were aware of their unusual behaviors and reported it to authorities. Investigations found that these two suspects visited China frequently and received money from unknown sources. They took advantage of the nature of their work to gather military secrets and recruit military officers for Beijing (陳志賢，2019；錢利忠，2019).

Countermeasur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aiwan from China's spies and agents, Taiwan's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countermeasures. In 2019, Taiwan revised four bills reg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several times. They are the Criminal Code (刑法),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AGRTAMA,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the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CNSIPA, 國家機密保護法),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國家安全法).

The ROC Constitution defines China as its own territory. Ther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s not a "foreign nation", and "offenses against external security of the state" cannot be applied to Chinese spies. As a result, spies from China are only given light sentences under special laws. On May 7, 2019,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Code extended penalties for "offenses against external security" to Chinese nationals and resident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For those who make agreemen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or with the personnel they dispatch to endang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ROC, the prison term is seven years to life (Sean Lin, 2019; 謝君臨，2019；謝君臨、蘇芳禾，2019).

One the same day, the CNSIPA was also revised. The sentence for those who

leak or submit state secrets to China, Hong Kong, Macau or other hostile foreign forces was extended to three to ten years. The sentence for those who probe or collect state secrets for China, Hong Kong, Macau or other hostile foreign forces was extended to one to seven years. If the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as absolute secrets, the above punishment can be aggravated by 1.5 times, and the death penalty may be applied during wartime. In addition, for retired and resigned personnel who had access to secrets, the current three-year travel restriction to leave Taiwan cannot be shortened, but it can be extended to six years (Catherine Lin, 2019; 吳政峰, 2019).

On June 19, 2019,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was revised.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sion is to impose higher sentences and fines on people spying for China or other nations. Under the amendments, military officers, public servants, state-run enterprise employers or public-school teachers who are involved in Chinese spy espionage cases would lose their pension. For those who have already retired and receive the pension, the benefits amount paid up to the date of their conviction would have to be returned. Besides, those who probe, leak or transmit documents, images, electronic files or other item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to hel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face a minimum of seven years in prison and a fine of between NTD\$50 million (USD\$1.6 million) and NTD\$100 million (USD\$3.2 million). Under the amended act, attempted offenses would be punishable as well. However, those who confess the espionage activities would be given lighter sentences or exemptions (Hsieh and Hetherington, 2019).

Finally, the AGRPTAMA was revised on July 3, 2019. Old regulations require mayors, county commission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obtain approval from their supervisory agency before traveling to China. Under the amendments, these people would also be required, upon returning to Taiwan, to report to their supervisory agency. Moreover, the amendments add that retired or former employee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ssociated with 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or China affairs agencies and who worked with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or secrets could also be required to report to a supervisory agency before and after travel to China (Huang and Hsiao, 2019; 周思宇, 2019; 黃欣柏, 2019).

Other than these revisions, to preve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CP from conducting activities that harm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ors from the ruling party in Taiwa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lso proposed to make regulations on the registration of CCP's agents in Taiwan, along the same vein as the US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However, this issue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in Taiwan's society. There is strong opposition from the KMT and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Even DPP legislato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herefore,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CP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中共代理人法) was postponed (Catherine Lin, 2019; 李欣芳, 2019).

It is clear that Taiwan's government is aware of the threats posed by Beijing's influence and infiltration. In fact, President Tsai Ing-wen (蔡英文) had previously said that she hoped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ould be passed to strictly regulate individuals, companie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spreading CCP propaganda, attending CCP-hosted conferences or issuing statements deemed harmful to Taiwan's sovereignty (Lee, 2019). Although the CCP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and the consensus for this legislation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other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fix Taiwan's legal framework.

Beyond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to do. To counter China's infilt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perhaps lies in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 Secret services all over the world use the same tricks. They exploit the weaknesses of human nature. Only when people are psychologically strong enough, could they resist the temptations of money and sex. Taiwan's government must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patriotism among its citizens. This would be implement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As revealed in this paper, the Taiwanese agents recruited by China's secret services extends from military officers to businessmen, and even to

tourists. Therefore, spiritual education should be applied not only to military officers but also to the general public.

Reference

- 吳政峰（2019）。〈「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正案三讀 法務部列出三大重點〉，《自由時報》，5月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82594>。2021/02/08。
- 李欣芳（2019）。〈中共代理人修法綠營湧現緩推聲浪 排除規範台商〉，《自由時報》，9月14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15413>。2021/02/08。
- 沈明室（2011）。〈「羅賢哲」共諜案對美臺軍售與合作的影響〉，《戰略安全研析》，第70期，頁5-11。
- 周思宇（2019）。〈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三讀！少將以上參加中共黨政軍活動 最重可剝奪月退俸〉，《風傳媒》，7月3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446727>。2021/02/08。
- 周敏鴻（2018）。〈史上最大共諜案鎮小江出獄 將被驅逐出境〉，《自由時報》，7月11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85486>。2021/02/08。
- 林偉信、呂昭隆（2015）。〈前海軍中將柯政盛 判刑1年2月〉，《中國時報》，3月1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17000414-260106>。2021/02/08。
- 翁衍慶（2018）。《中共情報組織與間諜活動》。台北：新銳文創。
- 陳志賢（2019）。〈攬國軍工程探機密 2包商涉共諜遭起訴〉，《中國時報》，9月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902002388-260402>。2021/02/08。
- 項程鎮（2014）。〈替中國情蒐、陷害同袍 前少校陳蜀龍判5年〉，《自由時報》，10月13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129842>。2021/02/08。

- 項程鎮 (2015a)。〈航管資料洩中國 前空軍上尉蔣福仲判無期確定〉，《自由時報》，6月12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346753>。2021/02/08。
- 項程鎮 (2015b)。〈航管機密賣中國 前空官蔣福仲無期定讞〉，《自由時報》，6月13日。<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88974>。2021/02/08。
- 項程鎮 (2015c)。〈上校當共諜 羅奇正判18年定讞〉，《自由時報》，11月25日。<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35225>。2021/02/08。
- 項程鎮、鮑建信 (2015)。〈中將共諜案 柯政盛退伍前就與中方接觸〉，《自由時報》，3月1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63507>。2021/02/08。
- 黃欣柏 (2019)。〈立院三讀！退將向中共旗徽敬禮要罰 最重可剝奪月退俸〉，《自由時報》，7月3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41172>。2021/02/08。
- 楊國文 (2016)。〈退役中將涉共諜 更一審判無罪〉，《自由時報》，5月18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700260>。2021/02/08。
- 錢利忠 (2019)。〈藉承攬國軍工程刺探軍事機密 2包商涉共諜案起訴〉，《自由時報》，9月2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903478>。2021/02/08。
- 謝君臨 (2017)。〈中國間諜滲透我方日益嚴重 此案最著名〉，《自由時報》，3月10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000123>。2021/02/08。
- 謝君臨 (2019)。〈共諜案輕判不再！刑法外患罪章修正三讀通過〉，《自由時報》，5月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81964>。2021/02/08。
- 謝君臨、蘇芳禾 (2019)。〈立院三讀 共諜納外患罪 最重判死刑〉，《自由時報》，5月8日。<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287115>。2021/02/08。
- Cole, J. Michael (2013). "Former Officer Gets 12 Life Terms in China Spy Case."

- Taipei Times, February 7.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3/02/07/2003554439> (accessed: February 8, 2021).
- Cole, J. Michael (2015). "The Spies Are Coming! The Spies Are Coming to Taiwan!" *The Diplomat*, January 22.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1/the-spies-are-coming-the-spies-are-coming-to-taiwan/> (accessed: February 7, 2021).
- Faligot, Roger (2019). *Chinese Spies: From Chairman Mao to Xi Jinping*. London: Hurst & Company.
- Hsieh, Chun-lin and William Hetherington (2019) "Sentences Toughened for China Spies." *Taipei Times*, June 20.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9/06/20/2003717240> (accessed: February 8, 2021).
- Huang, Hsin-po and Sherry Hsiao (2019). "National Dignity Rules Passed." *Taipei Times*, July 4.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9/07/04/2003718085> (accessed: February 8, 2021).
- Lee, Hsin-fang (2019). "Some in DPP Want 'CCP Agent' Review Put on Hold." *Taipei Times*, September 15.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9/09/15/2003722331> (accessed: February 8, 2021).
- Lin, Catherine Kai-ping (2019).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aiwan's Five Amendments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Defense Security Weekly*, No. 57: 43-47.
- Lin, Sean (2019). "Local, Chinese Spies Face Same Penalties." *Taipei Times*, May 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9/05/08/2003714745> (accessed: February 8, 2021).
- Mattis, Peter (2014). "China's Espionage Against Taiwan (Part I): Analysis of Recent Operations." *China Brief*, Vol. 14, Issue 21, November 7.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as-espionage-against-taiwan-part-i-analysis-of-recent-operations> (accessed: February 8, 2021).
- Pan, Jason (2015a). "Chinese Espionage at Military Bases Increasing." *Taipei Times*, November 1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5/11/11/2003632174> (accessed: February 7, 2021).

Pan, Jason (2015b) “Spy Guilty Verdict Upheld.” Taipei Times, November 25. <http://www.taipe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5/11/25/2003633269> (accessed: February 8, 2021).

Shen, Ming-shih (2018). “China’s Recent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Taiwan’s Countermeasures.”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No. 22: 1-5.

摘要

本文從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鬥爭的歷史出發，中國共產黨派出的間諜不僅在成立初期，讓該黨免於在中國國民黨的緝捕下摧毀；在國共內戰時期，更是中國共產黨得以擊敗中國國民黨的關鍵。因此，在 1949 年國民政府遷移到台灣以後，中國共產黨依然沿用相同的方式對付台灣。其次，當台灣成為民主國家，並且開放兩岸的貿易與交通，中共間諜對台灣的滲透也隨之升高。本文於此分析近年來中國共產黨蒐集台灣軍事情報的手法，並簡述重要的案例。最後，台灣也在積極強化反制措施，包括對於刑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國家機密保護法、以及國家安全法的修訂。本文另指出，除了修法以外，政府必須加強台灣人民的愛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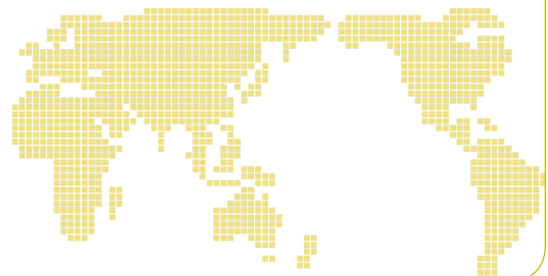
關鍵字：中國間諜、滲透、軍事情報、愛國心

協會簡介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成立於 2018 年 6 月，是一個非營利、非官方、獨立於各政黨之外的民間協會。協會創立的宗旨有二：1. 建構國內、兩岸、亞太地區的產、官、學各界合作與對話平台；2. 針對亞洲區域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和平研究與區域整合的學術、調查研究以及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基於促進兩岸與亞洲區域穩定和交流的宗旨，本協會主要的活動包括廣邀產、官、學的專家學者舉辦專題座談與演講；出版電子期刊；承攬產、官、學相關的研究計畫；出版或補助出版相關的專題書籍；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相關議題撰寫主題評析等。

協會創立之會員，主要來自學界（大學教授）、媒體朋友、各級政府文官或幕僚、基層民意代表，以及產業界的朋友。期待創造產、官、學的合作平台，以發揮分進合擊的效果。



我們相信，兩岸與區域的穩定，奠基於多元的交流與信任。而民間的交流是創造共識、建立信任的基礎。在當前國際局勢變化快速、兩岸關係始終難以突破的僵局下，本協會希望能藉由各種交流活動，激發創意和想像，共謀區域與兩岸的穩定和和平。更多關於協會的介紹、研究成果、活動等，歡迎參見協會網站。

協會網址：<https://apeptw.org>

E-mail: apeptw@gmail.com

通訊信箱：40799 台中郵局第 5-120 號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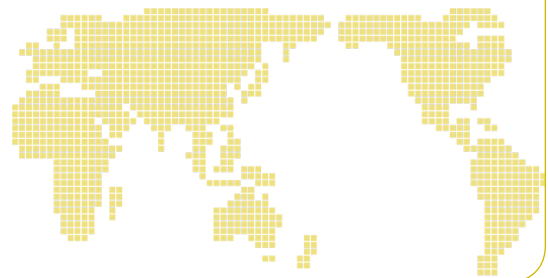
我們也歡迎各界朋友加入協會，或捐款支持協會的活動。入會辦法請參見協會網站。捐款資訊：

郵局（代號 700）帳號：0021057-0379711

戶名：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 沈有忠

徵稿啓事

- 一、本刊是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本刊物旨在研討亞太區域、兩岸關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尤其歡迎針對當下的各國重要的政經議題、國際與區域的衝突和穩定，提供時事評論或研究論文。
- 二、期刊的出版分為兩個部分：1. 時事評論；2. 研究論文。時事評論配合協會舉辦的座談會，或針對當下重要的政經議題撰寫短文。研究論文則歡迎各界學者專家針對符合期刊宗旨的研究論文投稿。
- 三、期刊出版時間為每年 4、8、12 月；採紙本與電子期刊方式出版。收到稿件後，時事評論部分由編輯委員會邀稿或審查；研究論文由編輯委員會建議審查名單，送學者專家進行審查。通過審查的評論或論文，將致贈當期期刊兩冊，並酌予稿費。



- 四、本刊物謝絕翻譯作品、禁止一稿多投。本刊有權針對不符合格式、主題，或相關規範之稿件予以直接退稿或要求修訂，再予以審查。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請務必恪遵相關著作權法之規定。撰稿體例請至本刊網站參閱，網址：<https://apeptw.org>。
- 五、本刊刊登之評析與論文，版權皆歸本刊所有，未經本刊同意，禁止轉載。作者保有著作人格權，可供未來集結出版、教學與研究（非營利）使用。
- 六、本刊歡迎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來稿。稿件取得雙方同意之文字使用慣例，並簽妥出版同意書後予以出版。稿費依本刊規定換算人民幣後支付。
- 七、本刊採隨到隨審，來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apeptw@gmail.com；或將紙本以掛號寄至協會信箱：40799 台中郵局第 5-120 號信箱。本刊收到稿件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受理狀況。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第六期】

發行人：陳文典

主編：沈有忠

副主編：張峻豪

編輯委員：廖達琪、陳佩修、蔡東杰、楊三億、蔡榮祥、陳秋政

執行編輯：林子立

出版年月：2021年04月

定價：單冊新臺幣 300 元，全年三期新臺幣 800 元；

學生憑學生證訂購單冊新臺幣 250 元，全年三期新臺幣 700 元。

出版者：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電話：04-23590121

傳真：04-23590256

網址：<https://apeptw.org>

製程管理：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SN: 2664-3650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No.6 April 2021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Special Topic: Asian Pacific

Decoupling and Recoupling: Biden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and Japan's Responses

Boyu Chen

Biden's Grand Chessboard

KP Ng

The RCEP under US-China Trade Conflict

Jia Li

Analysis of the CCP's Taiwan Policy in the Two Sessions, 2021

Wen-Hsuan Tsai

Special Topic: Burma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Myanmar Coup d'État

James W.Y. W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Myanmar's Military Coup

Yu Szu-Tu

| ARTICLES |

Chinese Spies' Infiltration in Taiwan

Jun-deh Wu

